

□解滨生

# 黄 梅 戏 在 东 北

在中国戏曲的近四百个剧种中，人们称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为中国戏曲的五朵金花，简称为京、评、豫、越、黄。不知是谁给排的顺序，我想若论观众的喜爱，恐怕它们的位置还要有变化，但是不管如何，黄梅戏已被当今观众评为最喜爱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由一个活跃乡间沃土的小剧种发展到今天国内外公认的、观众喜爱的一个大剧种，不但令安徽省戏剧界的朋友们高兴，也让我们这些外省戏剧界的同行们高兴，特别令我们这些曾经从事过黄梅戏艺术的同事们更感觉到高兴和骄傲。

四十年前的1960年，我们曾受四平专员公署的委派，组成了吉林省四平专区南花北移黄梅戏学习队，由漫天白雪的塞外，到绿荫如春的江淮大地上学习黄梅戏，分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和安庆市安徽黄梅戏学校（当时称为安庆艺校）两地学习，两年的学习后，在东北的吉林省四平市，我们组建了吉林省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上演的剧目有《天仙配》、《女驸马》、《碧玉簪》、《罗帕记》、《江姐》、《社长的女儿》、《红色娘子军》、《战地重逢》等，演出的足迹遍布东北各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正当剧种和剧团兴旺发展之际，一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十年浩劫，不但使国家千疮百孔，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也使这个刚刚扎根于东北的黄梅之花夭折了，给黄梅戏的发展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剧团虽然没了，但是却给黄梅戏的扩展和沿革写下了历史一页。东北四平黄梅戏剧团的建立，是黄梅戏发展的重要一页，但在近年黄梅戏艺术发展中很少提及这段历史，笔者有幸曾参加了南花北移的学习，自学习到建团直至最后的解体都在原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工作，更为有幸的是笔者曾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和安庆艺校两地学习，了解一些两地的学习情况，今天写这篇纪念文章，以其回忆黄梅戏在东北的一些活动情况。为黄梅戏发展史的空白点上补上一笔。

## 是谁提出了南花北移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开发较晚，满蒙的游牧民族较多，大多是中原一带的移民，人文历史不如南方久远，文化积淀也不如南方那样深厚，因此，东北的剧种不多。解放前，除了东北

二人转和东北大鼓等几个曲种外，没有自己的剧种。1958年后，在东三省相继产生了吉林省的吉剧，黑龙江省的龙江剧和辽宁省的辽南剧（后改称为辽剧），吉林扶余的新城戏等几个主要剧种。吉林省在二人转音乐的基础上，发展成立了吉林省的吉剧，创建了自己的剧种，排练了三小一大《桃李梅》、《燕青卖线》、《包公赔情》、《搬窑》等几个创剧种的戏。1959年的一个秋天，周恩来总理到吉林视察工作时，观看了吉林省吉剧团建团创作的几个戏，看后很高兴。当座谈到吉林省的剧种少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谈到，“有条件自己创建剧种，如果没有条件，南方剧种多，可以移植嘛，南花北移嘛。”参加座谈的各级领导顿开茅塞，在省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各地区的领导纷纷落实。省直移植了江西省的赣剧，长春市移植了河北省的河北梆子，吉林市移植了河南省的豫剧，通化市移植了山东省的吕剧。各地有各地移植的情况，诸如通化市，山东省跑关东的山东老乡比较多，所以他们移植了吕剧。当时四平地委宣传部的刘震海部长，在延安时曾是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对总理感情深，因此，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不但有积极性，也更扎实更快。

1960年初，中共四平地委做出决定：为发展文化艺术事业，首先成立四平专区艺术学校，再由艺术学校的学生中选择优秀的学生赴南方学习，移植南方的剧种。当时，由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刘震海同志负责成立选择剧种的班子，从领导部门和文艺单位调集了相关的业务干部。为了慎重起见，组织专门人员听唱片、看电影，了解什么剧种好听、老百姓喜欢什么剧种。恰在这时，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正在全国放映，“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已在东北大地到处传唱，那优美的唱腔，动人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打动了东北的广大观众。黄梅戏受到了选剧种的几位专家和领导的一致赞许，经过几次的复听，复议，又经四平专员公署领导的集体审定，决定学习黄梅戏。为了更好地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四平还决定学习上海的越剧，一经选定，就在新成立的四平专区艺术学校的学生中，优中选优的选出了四平南花北移赴安徽省的黄梅戏学习队和赴上海的越剧学习队。为加强安徽省黄梅戏的力量，赴安徽省的学习队中又成立了两个学习队，一是赴安徽省团的学

习队（我们称之大班），一是赴安庆的学习队（我们称之为小班）。在派人去安徽省联系的过程中，学习队人员经过了短期的思想培训，在联系的人员回来后，1960年9月，三支学习队分赴安徽和上海，我们登上了南去的火车，踏上了南花北移的征程。

### 难忘的艺校生活

笔者有幸在学习队中先被派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学习（将在另篇文章中介绍在省黄梅戏剧团学习的一些情况）。后来，为加强安庆的学习力量，又把我和李桂珍、余珍珠、赵明春等四人派到安庆艺校学习，因我们四人曾在专业剧团当过演员，在业务上有些基础，又因年龄小，可从基础上学习黄梅戏。在一天的夜里，我们坐上汽车（那时合肥至安庆还没有通车），在庄玉林队长的带领下，由合肥出发了。汽车在连续不断的细雨中，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于凌晨两点钟左右，到达了安庆。那时马路上也没有路灯，我们踩着泥水，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绕着城墙外的土路向安庆艺校前行，夜静更深连路也看不清。到了安庆艺校，当时记得是一片漆黑，只见几栋空旷的，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四周连个简单的围墙都没有，校中心没有广场，只有一个能养鱼的大水坑，当时没什么好印象。但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的铃声响过以后，院子里一片沸腾，满院子的学生，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才感到艺术学校的艺术气氛。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在安庆艺校的学习生活正式开始了。

我们在学校称“代训班”，全是东北的学生，全班有十七八个人，年龄都在十四五岁左右，个别的有十七岁，各行当齐全，而且还有专学乐队司鼓和乐队主胡的同学，基本上是一个能够为将来完全自力演出的实体。学校处在初创时期，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南侧有一个两层高的教学主楼，东侧有两个大练功室（现在回忆起来就是仓库），北侧是学生食堂，练功室的后面是学生的男女宿舍，学生宿舍的后面是在校老师的宿舍，校园中心本该是个广场，没有广场而却是个大坑（后来在全校学生填大坑时，在大坑里我们还抓了好多野生的鱼在宿舍烧了吃）。戏曲学校的学生不用锻炼，有的是锻炼的机会，一个早功比八回锻炼强度都大。学生宿舍是几十个人一屋，连窗户都没有，更没有暖气设备，一个床是两个人，一颠一倒的睡。宿舍离厕所较远，孩子们懒，宁可憋着也不上厕所，睡惯了热炕头的东北孩子，更不适应南方没有取暖设备的居住条件，更不适应江淮阴冷多雨的天气。因此，不论男女，孩子们一律尿炕。起初，还有些羞涩，不好意思往外面晾被。后来，受不了潮湿，不得不晾，结果，一拿全拿出来晾，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尿床。再到后来习以为常，大家还在看尿炕的图案，说谁谁会尿，能尿出四平家乡的地图来，大家向他看齐。能让大家看到家乡的图型。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的生活很困难，每天的主食是稀饭和地瓜（安徽称山芋）。中午的饭菜要分，那怕最后余下一点点饭，也要一汤勺一汤勺的分均匀，而且，分饭的人都要挑最为公正的同学来分饭，几粒饭都是要

公正的。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到附近的菜地去偷萝卜。那时各班的学生，几乎每周都到市内观摩，在路过菜地时，由细心的学生看好哪垅地的萝卜，在什么方位迈几步，量好，晚上归来时，由女生掩护，由细心的学生把萝卜挖出，（那时男女生很团结，女生也很愿意干这件事，因为回校她们也会分到萝卜吃）。回到学校后，仍由公正的学生把萝卜分成若干块，执行偷窃的同学，当然要多分一块，他劳苦功高，不然的话，下回他就不再去偷萝卜了。南方的池塘多，每塘都有鱼，我们东北代训班的小胖子（名孙成顺，因长的胖乎乎的，称小胖子，已故），一般执行危险的偷窃任务，他长的可人，招人喜欢，又小，一般被人抓到，一看那个好看的样子，气就消了许多，偷鱼的任务都是他来完成的。偷来鱼，再由人到校食堂要来盐，放火上一烤就那么吃了，一次小胖子又去偷，恰巧一个女哑巴看池塘，根本没心思看小胖子的可爱，一直追到学校，告到万校长那里，为此，小胖子不但受到了我们黄梅戏学习队领导的批评，也受了非常严厉的万校长的批评。当时，我们年龄小，又都第一次离家，不适应南方的气候，生活上不怎么能自理，大家的头上都长满了虱子，由吃到住，应该说我们都经历了人生最为艰苦的时期……

生活上虽然艰苦，但是在学习上，在课程的安排上，在办校育人上，安庆艺校可以和国家任何一个艺术学校教学媲美。每天八节课，一个早功，一个晚功，学校练私功成风，至到晚上练私功的也不断。课程中有唱腔、文身段（内含指法、水袖、扇子等）、武身段、把子、乐理、剧目、黄梅戏沿革、文化课等。各年级都配备了强有力的老师，当时教我们基本功的是李长喜、龚云来老师，教唱腔的是邹老，教文身段的是吴贤福和邹老师（女），教武身段的是万老师，带班排戏的是陈华轩老师，此外还有于老师，陈正国老师等，班主任是秦启霞老师。这些老师不但专业技术好，为人的品德也高，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们本身都是好演员，但他们却牺牲了自己的专业，把心血全部的投入到了艺术教育事业上，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东北的学生格外的细心，南方的孩子来两遍，我们可能来三遍，而且早加课，晚加功，有些老师是偷着给我们上课。比如陈正国老师，专业比较优秀。我们都知道他的专业好，希望他给我上课，但当时他的政治身份不好，为了我们，他偷偷的给我们上课。由于老师们耐心地教导，同学们刻苦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就排演了大戏《珍珠塔》、《女驸马》、《天仙配》和小戏《夫妻观灯》、《打猪草》、《补背褙》，武戏还排了《三岔口》等剧目。1961年的秋季，我们回东北，在四平向东北人民作汇报演出，我主演了大型黄梅戏《珍珠塔》，本剧的指导教师陈华轩还随队去东北，做为本剧的艺术指导，参加本剧回东北的汇报，演出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共四平地委和四平专员公署的领导热情地接见了我们（那时还没有现在的五大班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报纸也发表了热烈情洋溢的报道。我们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得益于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也得益于安庆艺校这种学习的氛围，安庆艺校这种特殊的教学环境，严格的

教学制度,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一旦进了学校就有一种自发向上的学习精神。那时不论年龄的大小,地域的差别,也不分行当,早晨一把顶就是十五分钟,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十几岁的孩子,十几分钟以后,连鼻涕带泪,每个学生下来后,浑身哆嗦不以,不管学生怎么样的哀求,老师就是不准你提前下来,而且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藤条教鞭,打下一道红印,那是真疼啊,虽然是疼,但孩子们都明白这是老师在严格的管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严格的教管之下,各个班级都能出现优秀的学生,不断的出现黄梅戏的优秀演员,学生从小就明白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的道理,虽然这些道理没有现代的某些道理那么先进,但就在这些朴实的道理中,安庆艺校培养了数以千记的优秀的黄梅戏表演艺术人才,因为工作的关系,作者有幸能够接触到各类艺术院校的学生,均没有这个学校的教学效果,东北的学生,一年能练一个“出场”(一种跟头,也称“蹇子后空翻”),在安庆艺校,我们亲眼看到,半年的学生就能翻“小翻提”(是一种比“出场”更难一点的跟头),当时的训甲班,早功放开翻“串小翻”的时候,长长的练功室,能从最西的起端,翻到最东端,能翻五十多个小翻的不足为奇,王胜利,龚洪涛,我们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黄梅戏本没有武戏,可是训甲班的大型武戏《杨门女将》,开创了黄梅戏的新纪元,轰动了安徽省的文艺界,也在长江流域各大城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行当齐全,武打设计新颖,当时的老旦胡静,武旦姚美美,花旦董文霞,武生万迪汉,至今我们还常常的讲起这些同学,他们不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为主要的是给黄梅戏艺术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与安庆艺校的开放教学有关,学校除去黄梅戏的唱腔和黄梅戏本剧种的教课戏配备黄梅戏的本土老师外,武身段,把子,武戏等,都由京剧的老师来教,我们学的文身段我们得知都是老师们从四川的川剧学来的,我们记得凡是来安庆演出的好剧团,名演员,学校都要请到艺校来讲课,好的还要高薪聘请到艺校当老师,我记得当时的金丝猴老师就是为了教猴戏专门请到艺校来任课的。正因为学校采取了开放教学,不是传统的封闭的教学方式,所以,学校才出了那么些文武兼备的优秀的黄梅戏表演艺术人才。我们至今虽已是一批六十左右的老人,但谈起安庆艺校,仍怀念这个学校对我们的教育。

1962年的春天,我们大班的学习队在省团学习结束,在东北成立了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因演员队伍急需充实,我们安庆艺校的学习队,学习结束,带着《珍珠塔》,《天仙配》,《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武戏《三岔口》等一批黄梅戏的优秀剧目,一行二十余人,阔别了历时二年学习时光的安庆艺校,与老师们洒泪而别,校领导及我们的代课老师为我们送行。望着长江的流水,客船徐徐的离开了安庆这座历史的名城,从此结束了带有历史意义的南花北移,我们是既喜悦又心酸,喜的是我们学习结束,回到家乡,心酸的是,离开了教育我们成长的安庆艺校,离开了情如父母的那么多师长,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回到安庆?时间虽短,但在我们的人生,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记忆。结果是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我们走了上水,由安庆逆水而上,经武汉,走京汉路,到北京,由北京回到了东北。

### 黄梅戏在东北

我们回到了东北,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已经挂牌成立。由于安庆小班的加入,更使黄梅戏剧团如虎添翼,安庆来的小班,还被称为正统的黄梅戏派。唱腔多是老腔老调,那时地委的领导不像现在的领导到剧团要请,那时地委的领导到剧团像到自己的工作单位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很随意的就到了剧团,更不像现在有的领导一到剧团,剧团就要请吃饭;他们到了剧团,随时就想听听剧团的演员的唱腔,有没有进步,时而又对着唱片听听我们和唱片的差距,提一些希望和祝愿,空着肚子离开了剧团,而且留饭都不吃。

大班从省团也学的是《天仙配》,《女驸马》,《碧玉簪》,《打金枝》,《香罗帕》和一批黄梅戏小戏,我们就凭着这些大戏和小戏,演遍了吉林省的各个主要城市,还到了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鸡西,一直演到了黑龙江省的边境城市鹤岗市,罗北县,一巡就是六个多月,演出受到了各地观众和文艺界同行的欢迎,由于省团《天仙配》和《女驸马》的影响,东北各地的观众都知道黄梅戏是安徽省的剧种,东北突然的冒出了一个黄梅戏剧团,大家都感到新奇,都想看看东北人演的黄梅戏什么样,从演员的阵容上,都是十七八九,二十左右岁的青年,那时,在东北境内,全是青年演员为主体的文艺团体并不多,所以也非常令东北的文艺团体的同行们羡慕,一个哈尔滨一演就是一个月,这在一个地区级的团,能演这么长的时间是不多见的,往南演到了辽宁的沈阳,辽阳,营口,抚顺,鞍山,海城,准备大连过海,再返安徽省,向安徽省的老师们汇报,并借此南下,奔赴上海,长江沿岸,扩大东北黄梅戏的影响,只是当时阶级斗争的提法越来越严肃,地委强令剧团回四平赶排反映阶级斗争的剧目《夺印》,才不得不中断这次南下的计划。

当时的剧团为了加强对黄梅戏本体的建设,加强黄梅戏的韵味,还从安徽省团请来了丁翠霞担任我团的艺术顾问,方绍堃老师担任我们四平黄梅戏团的作曲指导。指导我们团的业务训练和剧目的排练,以保证黄梅戏的纯正风格,在头一二年的演出时间里,大都以学习剧目为主,随着演出量的增多,各主要城市的重复演出,一些老的剧目不能反复的重演,按照演出市场的需要,需要排一些新的剧目,全体演员也积极的要求排练新的剧目,剧团多方面的成熟,也需要有新的剧目诞生,根据这一情况,剧团首先开始移植全国演出市场较好的剧目,其中有《江姐》,《社长的女儿》,《年青的一代》,《箭杆河边》,《豹子湾战斗》,《红石钟声》,《红色娘子军》等剧目,这些剧目,几乎又在全东北走了一圈,尤其是我们团演出的《江姐》,演出了超百场,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到沈阳市的北市场演出,沈阳市的北市场,有十几个剧场,六十年代每

天都有十几个剧团在此演出,我们团在北市场演出时,当时正有号称全国八大戏曲剧院的沈阳评剧院也在演出《江姐》,此外,还有辽宁歌剧院演出的原版的歌剧《江姐》和其它剧团演出的话剧《江姐》,京剧《江姐》等,他们演出后都来看看黄梅戏的《江姐》,观后同行们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重要的场次演出,不但给黄梅戏在东北扩大了影响,剧团造成了较好的声誉,同时剧团也取得了较好的收入。

那时的剧团,不像现在,有时一个剧目就在一地演上一个月,巡回演出时,这个剧团接着那个剧团,剧场一天不空,演出剧目不能重复,有时上个剧团是一个较好的剧团,阵容好,又是你这个剧团演出的主要剧目,因此,你接着这个剧团演出,三天炮打不住,你这个剧团就得黑下来,我们上边演出的剧目虽然都是优秀的剧目,但也都是当时各剧团主要的上演剧目,虽然剧种不同,但内容是一样的,因此,也常常影响剧团的上座率,加上剧团的不断成长壮大,又从大学里调来了最优秀的编剧,当时文艺界的形势是革命现代戏喊的比较响,因此,我们团根据电影文学剧本《团圆》(即今的电影《英雄儿女》)改编成大型黄梅戏《战地重逢》,不但参加了四平地区的戏剧汇演,在当时东北的剧团很少有一个全部是一期培养的演员,而且全部是青年演员,特别是四平地区,舞台上是全新的阵容,清一色的青年演员,令各剧团耳目一新,羡慕不已,再加上剧本传奇的内容,剧目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有报刊评论,汇演专刊的剧评,受到了各方的夸赞。

不久,全国又掀起学习王杰的热潮,我团又用很快的时间赶排了大型黄梅戏《革命青春的赞歌》,也在四平地区,和四平的周边地区演出了多场,这两个戏是我们两个南花北移学习队回到东北以后,由学习剧目,移植剧目,移植改编,到独立创作,走上了一个文艺团体正常发展的正规之路。当时,全团的演职人员都在二十几岁,由学习到实践,正是一个剧团,一个演员的黄金时期,大家的事业心极强,蓬勃向上,几次的反复的计划排几个好的自创剧目,再返安徽,在合肥的江淮大戏院,安庆的皖江大戏院向安徽人民,向省团的老师,向安庆艺校的老师汇报一下在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培养的东北这个黄梅戏剧团的学习业绩,大家也雄心勃勃想再返安徽省,叫老师们看看,东北的黄梅戏什么样,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场殃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平地委的一些造反派们,就贴出了南花北移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为文艺黑线招降纳叛,培养三名三高等政治罪名的的大字报,大字报贴满了全城,决定南花北移的和特别爱护黄梅戏剧团的地委书记王静坚同志,是个刚强的老头,受不了造反派的污辱,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吊死在他主持工作的大楼上的一个厕所里。大树不倒,各级领导也就成了“孝子贤孙”,批的批,斗的斗,铺天盖地横扫了一切,七斗八斗,把挺好几个剧团斗个七零八落,又被对立派砸个稀汤哗啦,清理阶级队伍清理了半年,又到五七茧蚕场劳动改造半年,这还不算彻底,当时的革委会的头头们说这伙人改造任务重,要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此时正好传

来一个江西五带经验(带户口,带家属,带粮食关系等)、全部化整为零,一律到农村插队落户,原来在蚕场,虽然在各山上,大家偶尔的还能见面,谈谈艺术,唠唠黄梅戏,而插队落户,大家连面都见不到了,也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家找来找去没找出什么原因,找到黄梅戏这个黄字不好,犯在黄上,而且最后归在黄土地上,大家说这是归位了,就这样,由周恩来总理倡导,各级文艺部门实施的南花北移,就这样彻底的结束了,一个好端端的黄梅戏剧团就这样的解体了。

我们也都当上了名符其实的农民。

### 黄梅调余音缭绕

大约在1970年的时候,文艺界有些松动,各地都办起了样板戏学习班,四平也不例外,先后成立了四平地区样板戏学习班,基本立足以原黄梅戏剧团的一些演职员为主,加上上海、长春的一些知识青年,当时虽有办黄梅戏的议论,但处于学习样板戏的高峰,谁也不敢说办黄梅戏这样的话,待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春天真正来临,四平地区办什么剧种最为合适的时候,大家才真正的提出办黄梅戏剧团的意见,向上级打了报告,虽然这批人经过十年的浩劫,业务有些荒芜,但主要业务人员还在,特别是还有安徽省黄梅戏的大本营,有剧本的来源,有剧目的来源,而且还有一批关心我们的各个行当的省团老师和安庆艺校的教师,加上黄梅戏在全国的良好影响,特别是还有一批三十几岁的,曾在安徽省学习的黄梅戏学习队员能够成立一个较好的黄梅戏剧团,但在这时,吉林省也恢复了自己创立的吉剧,而且吉林省委也大力培植自己的剧种,也有相关的扶植政策,四平市是吉林省的主要地区,当时有话剧团,评剧团,民间艺术团(二人转剧团),还有一个以京剧,歌舞为主体的剧团等待改建剧种,但时过境迁,此时,经过文革,一些领导者也吸取了一些消极的教训,也知道黄梅戏不错,但没有人像当年四平地委主要领导那样冒着风险去坚持办一外来的剧种,而且省地上下文化部门的领导者都是一致的,所以,虽经一批老黄梅的极力呼号,奔走,请求,终在省文化部门领导的劝动下,把一个以黄梅戏演员为主体,另有京剧,歌舞一些主要演员参加的一个待改建的团体,建成了四平地区吉剧团,此时,存在于东北的四平地区黄梅戏剧团真正的从吉林省各地区剧种的分布图中消失了,牌子没了,黄梅戏的公章销毁了,黄梅戏剧团人员的编制,财政拨款也都从有关部门取消了,南花北移这段历史是真正的结束了。它存在的时间是十几年,其中学习二年,真正的活跃期是四年,它的解体不是历史决定的错误,也不是人员的素质不行,更不是领导者管理不善,它真正的解体是那场十年浩劫,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催毁国家的优秀文化,使国家千疮百孔,也催毁了刚刚扎根在松辽平原上的黄梅之花,这朵鲜艳花朵的凋谢令我们心酸,令我们流泪,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枝黄梅之花也许会在松辽平原上茁壮成长,开得鲜艳夺目,这些历史的教训不能不令我们文艺工作者反思……尽管如此,南

我与黄梅戏的情缘

○ 刘桂英

1958年,13岁的我考进了吉林省怀德县戏校,专攻评剧。当年戏剧舞台上演出的大都是传统剧目,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怀德县评剧团便赶排了现代戏《台湾来客》。这出戏需要一个小女孩,剧团领导到戏校,把我选中演小娟。从此,我便正式走进了戏曲界的大门。

196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来吉林四平地区演出,曾到怀德县献艺。声名远播的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老师和剧团全体受到了县领导和县文艺界的热烈欢迎。我有幸从剧团抽出作服务员,近距离地接触了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和王少舫。我还记得严凤英老师的细腻表演、甜美的唱腔和她那与众不同的水袖功夫。特别是王少舫老师在台后的一声叫板就赢得了全体观众的喝彩。我还记得晚饭前县领导问严老师想吃什么,她顽皮地操着东北口音说:“就吃你们东北的那甩袖子汤吧!”并做了一个甩水袖的动作,众人大笑不止。从此我便更加爱上了东北人能够听懂爱看的黄梅戏。

1960年四平专区成立艺校,我的老团长庄玉林从怀德县评剧团调到四平艺校,后来任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副团长,随即同黄梅戏学习队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进行“南花北移”工作。1962年怀德县评剧团下马,我去了黑龙江木兰县评剧团。

1964年春节,我回公主岭探亲,正值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来公主岭荣军教养院慰问演出,经老团长庄玉林介绍,我见到了主要演员刘乃玲大姐和王仁安导演,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从此以后,我便成为一名黄梅戏的演员。我这所以毅然决然地放弃有七年评剧生涯和青年主要演员的头衔,而到黄梅戏剧团当群众演员,主要原因就是我从心底喜欢黄梅戏。我心里想:只要我身在黄梅戏剧团,能够听到看到东北的严凤英——刘乃玲和东北的王少舫——王仁安的演出,我宁可跑一辈子龙套也心甘情愿。

“文革”时期,文艺界一片混乱,1969年,四平地区黄梅戏剧团解体了。几经周折,我被分配到辽源市园林管理处当了一名普通干部。从此,我们这些无名演员走到哪里就把黄梅戏唱到哪里。安徽电视台和中央台戏曲频道是我寻找黄梅梦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精神寄托。我看马兰,我看韩再芬,我买黄梅戏专辑影碟,买磁带回家学唱。当我担任单位的工会主席之后,借工作之便组织爱好者学唱、演出。在历次演出中,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如今我身患重病仍不忘黄梅情,故写成这几页回忆,以抒发我的情思。不久前,获悉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举行五十周年院庆,我的同事赵明春出资送去贺礼,代表了我們一代老友四平黄梅戏人的心声。当王仁安导演、刘乃玲大姐带回来的《黄梅戏艺术》上刊有《哪得情深如许》一文,真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黄梅情结写得酣畅淋漓。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噙着充满深情的泪水,由衷的感谢杨璞老先生说出了我36年前为学习黄梅戏艺术的追求、探讨和艰辛,更说出了我与黄梅戏的情缘。

花北移,它还是为中国的黄梅戏发展史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为黄梅戏的扩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黄梅戏在东北的影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梅戏剧团虽然不在了,可是我们这些人还在,没有专场的演出,但在各类晚会的演出中,黄梅戏仍然是活,各种演唱会,各种晚会都有它的声音出现,由于四平黄梅戏剧团的影响,黄梅戏还是特别受欢迎的剧种之一,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综艺晚会的盛行,黄梅戏更是多种晚会的重要文艺品种之一,加之,马兰,韩再芬等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在当今中国各种舞台上的影响,黄梅戏更是四平舞台上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之一,非但如此,在乡间,在社区,在公园,

在酒店,在各种文艺联欢的会议上,也常有它的声音出现,四平人说唱黄梅戏这伙人是阴魂不散,而且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是安徽排出什么新戏,有什么好腔,这面就传唱什么好腔,包括我个人订阅的《黄梅戏艺术》各种信息都及时的传递给这些黄梅戏的爱好者,除去当年赴安徽学习的队员除外,四平还有一批黄梅戏的痴迷者,特别是还有一批年轻人的加盟,按我们的话说是黄梅戏后继有人,黄梅戏在四平可谓是声腔悦耳,曲调迷人,余音缭绕,经久不衰,我们不再从事黄梅戏艺术,但我们还愿意让黄梅戏这枝鲜艳的艺术花朵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花香四溢,并衷心的祝愿黄梅戏能够更加兴旺发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黄梅之花开得更加光彩夺目。